



马伯声(前排右二)全家合影

## 【泰山精神】

## 工商巨子马伯声之“泰山梦”

□周郢

虽然在内战再起,兵燹满目的时局下,马伯声的建设大计已毫无实现的可能,但历史证明了这一系列预见的可行性——山麓公路、封山造林、旅游设施建设等,在之后的岁月中早已逐一实现。

20世纪上半叶的工商巨子马伯声,曾以开阔的视野、宏远的构思,为泰山建设绘制了蓝图。

马伯声(1890~1966),回族,祖籍山东德州,其父马仁德清光绪年间逃荒来到泰安。伯声生于泰安县城内圣泉街。幼年虽生活贫苦,仍好学不辍,先后求学于泰城天书观小学及杨氏义塾。后进入教会学校萃英中学免费攻读,“一战”中考取华工翻译,先后到过加拿大及英、法等国,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工业文明,确立了其实业救国的决心。回国之后,历经艰辛,先后创办仁丰纱厂、仁德面粉厂等,都取得巨大的成功,一跃成为山东工商界的领军人物。

马伯声在商贸业发迹之后,不忘根本,重建故乡清真寺,还在西关回族聚居区创办仁德小学,减免学费,为贫民子弟提供学习机会,先后“捐助校款达七万数千余圆……该校除课程知名全县外,军乐、国术尤为全县所景仰”。泰安回族教育的迅速发展,与马伯声的努力密不可分。

20世纪30年代,马伯声在泰山进行了一系列开发建设:泰山自民国以来,历经战火,林木破坏殆尽,马伯声联合泰安士绅,先后创办“泰山森林公司”、“仁德农场”,在泰山垦荒植树,引进美、日等国的先进技术,购入大量烟台苹果、肥城桃树苗及杏、梨、柿等2000余株。

马伯声不仅是一位泰山建设者,还是一位泰山规划者。抗战时期,马伯声避居天津,潜心于城乡建设研究,撰写了《山东省泰安市建设计划议》(1945年出版),自言“对于国家大计,愧无长策,兹仅就平生所得,针对上述农村所受之弊害,拟一泰安建设计划议,一则贡献于当局诸公,以备采择,再则就正于我乡父老,共同商榷”。其中一节专论“泰山建设”,文中首先陈述了他对泰山的整体认识与评价:“泰山为五岳之首,崇高秀拔,冠绝寰宇。岩壑峥嵘,胜迹棋布,雄势壮观,自古称最。不但国内士庶竞相来游,即国外人士亦往往以登临为快。曩在太平盛世,自春徂冬,游客络绎。而春秋进香者之多,每至肩相比而踵相接,其盛况概可想见。”然而,泰山虽有辉煌往昔,但在时人眼中,却是另一番景象:“改元之后,内乱频仍,炮火之余,民生凋敝。游客因之日少,河山为之失色。名刹古寺,渐就荒废,今则断垣残壁,到处皆是,荒烟蔓草,触目凄凉。可胜叹哉!”因此,有人作了泰山已老的论断:“论者或谓泰山风景苍老,雄壮则



马伯声的《山东省泰安縣建設計劃議》

有余,青葱秀丽则不足。”对此马伯声断然反驳:“至于‘苍老’云者,一言以蔽之,未加人工修建润色之故耳。”

那么,如何对这座千古名山进行“修建润色”呢?马伯声以实业家的锐利眼光,拟订出一番独具见地的建设方略:

首先是“开辟道路”。传统泰山登山主线路,只有中、西两条,均系盘道,石阶峻峭,游人艰于登陟。马伯声提出应修建通汽车之路:“自车站北行经赵家林、大众桥之道路,原可行驶汽车,惟由大众桥上,经过惠民坝(即今龙潭水库)、长寿桥、竹林寺、马蹄峪而达黄西河之山路,必需修筑开辟加宽。”“自车站至岱宗坊一段,必须修整加宽,得以通行汽车。”其他泰山途路,亦应以修治:“由岱宗坊至山顶之盘路,已年久失修,应彻底修辅——其支路一由斗母宫西行经白杨坊山洞至西山之竹林寺,一由二虎庙西行至西山之黄西河,均系樵径小路,崎岖难行。但沿途山明水秀,风景绝佳,极应就原有途径,随山就势,开辟修治,以便游览。”

其次为“种植树木”。马伯声早年即开办森林公司,致力于封山造林,在《议》中,他再次提出“绿化运动”的构思:“所有西山各路及东西两山间支路,以及山洞开辟之小路,均分段在沿路两旁栽植海棠、丁香、杜鹃、玉兰、紫荆花树,并藉花名以命路名。凡山前各区,除泰山林业公司、仁德农场所种植之树木果园外,其余隙地无论国有民有,均应普遍种树,完成绿化运动。”

水利建设也是马伯声着力思索的问题。泰山河道多属季节性河流,泰安城区时现水荒。清代有识之士建成“曹公渠”引入城,马伯声则提出“修建水坝”,从根本上解决水源问题:

“泰山之上水源不畅,河流时竭,夏日大雨时行,山洪汹涌。但因地势险峭,一泄千里,转瞬即消,以致城关一带,时有缺水之虞,亦有憾事!……兹拟在惠民坝之下,分段增筑水坝,以广蓄量。此外并拟在东山王母池下修筑水坝一处,大量蓄水,不特可以供全城饮用之需,且可作灌溉之用。至于已塞多年之白鹤泉,如能设法开浚,使之复活,则碧波鼎沸,可以媲美于趵突泉矣。”

最后,马伯声还提出了“创建泰山博物院”和“设立风景宣传所”的建议。对于“泰山博物院”,他作了如下构想:“泰山游客之多,自昔称盛。若再按上述计划建设之后,其对于游客吸引力之强,以视昔日不啻倍蓰。全年统计来游者之众,当不止百万也。此等游客中,学者名流、骚人墨客固然所在多有,然其大部份,仍来自乡村知识简陋者为多,徒知敬神佞佛,而于时代之知识则多茫然。我中华益益大国,有民如此,宁不愧怍!为提高国民知识水准起见,拟利用山麓旧有庙宇之房舍,仍照南北各大商埠博物院之规模,创设一‘泰山博物院’,藉游众赏山玩水悠游自得之心境,灌输以新(时)代之知识。有新时代之知识,而后有新时代之思想;国民均有新时代之思想,而后方能成其为新时代之国家。”从中不难看出这位实业大家欲借泰山开启民智、灌输新知的拳拳之心。

虽然在内战再起,兵燹满目的时局下,马伯声的建设大计已毫无实现的可能,但历史证明了这一系列预见的可行性——山麓公路、封山造林、旅游设施建设等,在之后的岁月中早已逐一实现。进入21世纪后,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亲自设计的“泰山博物院”更成为大众瞩目的工程。当一座新型博物馆在泰山上矗立时,人们也不应忘记它的首倡者马伯声。

(本文作者为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

老舍先生早年便有藏画的爱好,缘于他有一批画家朋友,如济南的关松坪、关友声、桑子中等,常在一起聊天,自然免不了谈到美术,所以,老舍先生很早就有关于美术的论述,或给画家的画集写序,或评论画家的画展和画作。画家也免不了赠给他画作,这些画作成为他墙上常年的装饰物。他很少花钱去买画。第一次花钱买画是在1933年。当时他在济南,写信求在北平的许地山先生帮他就近向齐白石先生求一张画,是按单付款的。结果得到一张非常精彩的《雏鸡出窠图》,可以被认定为齐先生中期的上品。从此,老舍先生对齐白石的画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成为齐氏作品狂热的崇拜者和爱好者,给予齐白石以很高的评价。1950年以后,老舍先生得以结识齐白石先生本人,并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老舍开始有意识地收藏齐老人的作品。最有名的故事是他以苏曼殊的四句诗为题求齐老人按诗作画。齐老人毫无困难地完成了此次按诗作画的任务,给出了很有艺术水准的佳作,恰是春、夏、秋、冬四景。有了这次成功尝试,老舍先生又给了几句颇有难度的诗句请老人作画,其中一句是查初白的“蛙声十里出山泉”,一句是赵秋谷的“凄迷灯火更宜秋”。在求画的信上,老舍先生用红毛笔记了注解,对上述诗句的作画构思给出了明确的设计方案,供齐老人参考。在“蛙声十里出山泉”之下,老舍写道:“蝌蚪四五,水中游弋,无蛙而蛙声可想矣。”“在凄迷灯火更宜秋”之下,老舍写道:“一灯斜吹,上飘一黄叶,有秋意也。”而且,他对这几句诗句的基调也定了调子,即“冷隽”两字。齐老人得到这样的求画信之后,经过认真思考和反复琢磨,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美术创作,绘就了两幅堪称他晚年代表作的佳作,轰动整个美术界,也使他自己的创作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蛙声十里出山泉”还被印成邮票广为传播。这两幅画作开创了由两位文艺大师共同合作完成艺术杰作的先河,成为这方面的范例,在文艺界传为美谈,甚至被写进了教科书,成为尽人皆知的故事。

## 【舒乙忆老舍之二】

## 老舍藏画

□舒乙

所有这些赠画装裱后统统由老舍先生亲自保管,放入他的书房壁橱中,还都郑重其事地在画轴的标签上题签,写上老人的什么作品,有时还署上自己的名字,证明是他的收藏。

所有齐白石老人的画作,老舍先生全部交给刘金涛师傅去装裱。刘师傅是徐悲鸿先生介绍给老舍先生相识的。他的技术非常精湛,深受老舍先生赞许和信任。老舍先生告诉他:“手工在未来工业化时代是最值钱的。”老舍先生曾在文艺界聚餐会上当着齐老人和众多文艺界头面人物的面起立郑重提议向“工人阶级刘金涛同志敬酒”,搞得陪坐末席的刘金涛本人完全手足无措,感动得落下泪来。刘金涛每次去老舍家中取画装裱时,临出门时老舍先生总要多给他点车钱,让他坐三轮车直接回家,避免路上有什么闪失。有时老舍先生还派子女去萃华楼饭店买几个大白馒头,让刘金涛吃饱了饭再走。

老舍先生还在荣宝斋、和平画店和文物商店特意选购了一批齐老人的旧作,都极有特色,像《孤雁》、《六节虾》、《早年花鸟人物画册》等等。

这样,老舍先生和胡絮青先生前前后后一共拥有超过上百张齐白石的作品,差不多都是精品,几乎将齐老人最有特点的作品选其代表一网打尽,包括他早期的作品在内,构成了一个有着高水平的齐白石美术作品收藏点。

老舍先生收藏书画和文物有他自己的特点。他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收藏家,他不花大价钱去收购极品,不刻意去索要那些上了谱的、入了册的名作。在这方面,他不同于张伯驹,也不同于邓拓,和郑振铎也不一样,他不买贵重的瓷器,不会倾其所有去追求一件国宝。他完全是以一种纯粹爱好者的态度去行事。自己认为好,看着漂亮,觉得美,或者觉得有些特别的价值,就可以了,也不太苛求品相,认为十全九美也是美。

他的这种态度足以将他划入另一类收藏家的行列,这类收藏家是以兴趣为出发点,非常自我,不受世俗的影响,也不专业,不求贵重,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可,是一种对艺术的偏爱,是艺术至上的唯美主义。他收得很杂,有字画,有拓片,有印章,有砚台,有扇子,有小古玩,等等。

他只收小件,绝少大器,除了一张沈周的大幅山水画外,找不到什么重器。

他收偏门,比如专收京戏名伶的绘扇,多达一百六十三把,构成一个专门的系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独一门。

到上世纪60年代,他的注意力全都放在收集京戏名伶的绘扇上,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工夫,非常有成效。他还定做了一批放扇子的木质锦匣,一匣可放十把左右,极为隆重。可惜,“文革”中期,由一些文物专家组成的“官方”抄家者并不真识货。他们认为唱戏的虽然都是名角,但毕竟不是正牌画家,不能入正统美术之列,应打入另册,在正式收据清单上只简单地写一句“扇子一摞163把”了事。故而,在“文革”后落实政策时,这一摞扇子,因没有注明作者和内容,竟然已经找不到了,成为憾事。如果不是这样,专门做一次京戏名伶绘扇展都有条件,还可以成立一个以老舍先生命名的专门的扇子小博物馆呢。可惜呀,可惜!

(本文作者为老舍之子,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中国老舍研究会顾问)